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市民社区建设

——基于 NJ 市 S 新村城镇化的考察

宋 喆^{*}

【摘 要】 以 NJ 市 S 新村社区作为样本,从微观方面观察和分析 S 新村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市民社区管理与建设的网格化与熟人社会相结合的治理实践,并进一步概括和提升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市民社区管理与建设实践的理论意义,即新市民社区建设必须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为核心,促进新市民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转变,充分凸显“以人为本”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价值,明确城镇化的建设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实现始终将人民群众利益置于首要位置的新型城镇化。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新市民社区;网格化治理;熟人社会;以人为本

当前,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矛盾,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目标,重点在于大力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其关键是提升质量。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市民社区管理与建设是体现以人为本的关键,是提升新市民生活质量的保障。为此,本文选取 NJ 市仙林大学城 S 新村社区建设作为样本,目的在于从微观方面观察和分析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市民社区管理与建设的实践,以进一步概括和提升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市民社区管理与建设实践的理论意义。

一、S 新村城镇化前“场带队”村庄管理体制的终结

据 NJ 市志记载,清朝同治年间,NJ 市仙林地区行政区划归属于上元县城北乡,民国初年并入江宁县。1950 年土地改革时期单独建制改为仙林乡。1959 年 10 月,南京农场从麒麟门东流镇迁至仙林农牧场后,市政府决定将仙林大队划归南京农场,作为 NJ 市建立和发展副食品的生产基地。农场根据“自然区划”、“生产需要”和“方便领导”的原则,将仙林大队划分为三个生产大队,并先后建起养鸡场和种马场,同时将原来属于尧辰分场的果树队、茶叶队调整为农场直属单位。1962 年,南京农场迁出后成立仙

^{*}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教授,210097。

林农牧场。农牧场实行“场带队”^①管理体制。1990年代,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发展,原来集中在市区的十余所高校陆续征用农牧场土地建设新校区。随着大学城不断开发,农牧场土地被大量征收,部分自然村撤销建制,“场带队”农民身份陆续以“农转非”方式转为城镇居民。这些“农转非”市民群体的居住地散布在“场带队”四周的村落社区逐渐转移到集中居住的新型城市社区,由于其身份、居住地以及社会角色都发生了整体上的重大变化,而且是一个新的利益群体,我们称之为“新市民”。S新村新市民社区来自农牧场“场带队”八个自然行政村的整体迁移。新市民社区破坏了“场带队”紧密联系的熟人关系网络,同时也使原有村落社区关系在新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面临新的社区重构。

一般而言,新的社区重构是由新型城镇化引发并推动的,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S新村新市民社区的建立就具有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意味。因而,“场带队”农民拆迁安置是NJ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这种需要更来自于城镇化规模扩张和发展实际。然而,“场带队”村庄的终结和农民身份的变化并没有使新市民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相反,许多新市民忧虑未来生活的变数,因为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失去了以农为生的工作,导致了生存风险的骤然加大。调查发现,对于新市民中老年人群体而言,他们由于没有工作,没有土地,没有技能,加上社会保障能力不足,社区缺乏经济统筹能力,转型期的新市民处于“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城市贫民社会保障”的弱势地位,他们对未来不可预期的因素增加,加剧了生活风险,对融入城市感到自卑和困惑。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农民市民化是传统农民脱胎换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也是传统农民走向“终结”和现代新市民群体“再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要求,而且将对我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当代中国,农民市民化的启动与农民土地的被征用密切相关,可以说,它是农民土地被征用以后而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而农民土地的被征用又是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发展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当代中国满足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现实选择。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整个社会支持网络也发生着深刻变化:一方面,由于在市场转型中发生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换,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单位支持弱化,新生社会支持体系还需要时间发育成熟;另一方面,现代化转型使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人们在熟人社会中结成的以血缘、地缘为依托的私人社会支持网络变得非常脆弱。为了适应巨大社会变迁的新情况,需要重新构筑社会支持网^②。然而,在社区管理中“这一代人死光了就好了”的观点不在于少数,甚至还有大学城的管理者曾经动议把S新村整体迁出,搬迁到另外一处居民安置点。在管理者看来,S新村的存在使得光鲜的大学城黯然失色,S新村看起来更像是“城市里的村落”。S新村社区从“场带队”村落社区到转型发展中的城市社区,必须实现和超越治理转型,即从乡村治理到社区治理的转型;在转型社区发展中,简单村镇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型城市社区发展,必须探索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尤其不能完全借鉴和模仿现代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因为新市民社区的居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认同都还处在一个相对脆弱的重构期,需要发展和培育的长期过程才有可能实现和完成。下文就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S新村的社区治理实践为例加以说明。

^①“场带队”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一种特殊的国有农场领导体制,即把社队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由农场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核算,统负盈亏,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制度。“场带队”是一种典型的二元体制。

^②李培林:《村落的终结》,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2页。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S 新村的社区治理实践

从原居住在松散于周边的村庄到新型城市社区的集中居住,S 新村“农转非”新市民经过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艰难跨越过程。在这样一个跨越中,“农业没有了,耕地没有了,一家一户的小农业生产方式没有了,血缘、地缘关系在快速的社会流动中也变得松散了,村落社会生活管理的职能在形式上也被取消了”^①。这类城市新兴社区又被称为“转型社区”^②。当然,“转型社区”并非中国独有。快速城市化下的中西方城市均存在“转型社区”。无论托马斯、伯吉斯还是帕克,芝加哥学派学者均以“转型区”为其研究核心。如同“转型区”成为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实验室”,“转型社区”是目前研究当代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变化的核心场域。

转型社区作为新市民最后一道屏障,承载着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发展和社区救助等重要功能,同样也承载着新市民社区变迁软着陆任务。这些社区居民统一居住在 S 新村社区的 39 栋公寓楼里。从年龄分布看,30 岁以下的社区居民占 26.2%,30 岁至 60 岁之间的社区居民占社区总人口的 58.7%,属于社区人口最多的一个居民层,也是目前社区人口流动幅度最大的居民层,60 岁以上的占 15.1%(S 新村社区居民年龄分布情况见表 1)。

社区被一条马路分成北村和南村,北村楼房建于 1995 年,共有 12 栋楼房,楼房共计 7 层,由于建得早,基础设施老化,目前显得简陋和破旧;南村共计 27 栋,是 2000 年之后的

表 1 S 新村居委会人口分布情况

18 岁以下	18—30 岁	30—60 岁	60 岁以上	总数
531 人	631 人	2604 人	668 人	4434 人

(数据来源:S 新村社区居委会时间:2013 年 12 月)

建筑,房屋结构设计和质量远远好于北村。社区居委会设在南村。S 新村社区居委会由 8 人组成,成员包括社区书记 1 人,主任 1 人,副主任 3 人,还有另外 3 名社区委员。居委会由社区居民选举产生。社区橱窗里列出了社区主任的 6 项主要职能^③。社区建设之初,小区周边建有一批廉价门面房,社区靠收取一些租金作为公共财产。2002 年初,因为这批房子影响大学城形象,后来全部拆除,做了绿化广场。社区运营常规经费主要来自街道拨款。该社区的治理实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网格化的社区治理实践

类似众多拆迁安置小区,S 新村社区流动人口多,环境整治困难。拆迁安置居民缺乏生计来源,小区里面日租房遍地。许多人家男主人不在外打工兼开黑车,女主人则以经营日租房为生。为了社区管理和基层维稳,社区采取类似于科层制管理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图 1)。S 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具体做法是:将整个社区划分为 14 个网格,每个网格有 2—4 幢楼。管理中,他们利用原行政村老党员、村组长,聘任他们担任“格长”和“楼长”参与社区管理。社区要求网格“格长”每周须走访辖区内 2—3 户家庭,以便了解民情,广泛听取小区内居民对社区管理方面存在问题的意见。

社区网格化治理客观上加强了政府对新市民社区控制。S 新村社区事无巨细,都分解在每一个

①李培林:《当代中国民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292 页。

②李志刚等:《快速城市化下“转型社区”的社区转型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07 年第 5 期。

③主要包括:第一,负责社区居民委员会全面工作,根据居民会议讨论决议,带领居民委员会组成人员,依法正确行使职权,积极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第二,宣传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和组织居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居民合法权益。第三,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宣传科技知识,经常组织居民开展学文化、学科学、学法律,管理和协调社区居委会成员工作。第四,组织居民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居委会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依照法律规定,负责管理本社区属于居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山林和其他财产,教育居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第五,对居民委员会和居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第六,对社区重大问题,经居民委员会集体研究后代表居委会向居民代表会议提请讨论决定。负责组织制定和修改居民自治章程,居规民约,提请居民代表会议通过并遵照执行。

社区管理者负责的网格里,即责任者与被管理者都在网格中。社区网格化管理是社区管理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再创造”,是一种对社会基础单元的联动反应能够做出“迅速处置”的管理机制^①。网格化管理实现了社区管理全覆盖,在街道和居委会等大格局不变的基础上,统一划分网格单元,明确管理对象,界定管理幅度,对社区实现属地化为特征的全方位覆盖;其次是强化整合力,在网格单元内有效整合,优化配置资源;第三是加强了社区数字化管理,由各单元构成网格,结构清晰,功能相近,提升了信息化基础上的数字管理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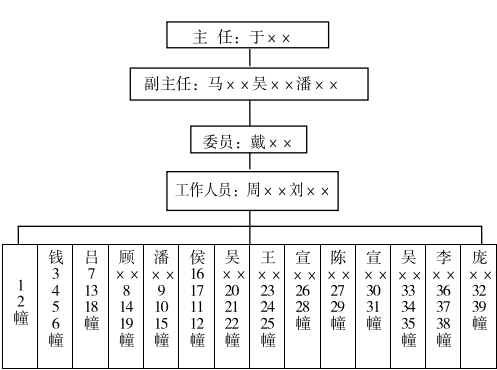


图1 S新村社区居委会网格化治理结构图
(S新村居委会2013年12月)

S新村社区服务内容简单繁杂。尽管社区居委会希望为社区居民做好服务,但是心有余力不足。社区新市民普遍关心的就业问题、看病问题和社区子女教育问题,居委会很难帮助解决。社区帮扶与社区救助是S社区居委会平常最重要的工作。S新村社区低保户共有222户,共计287人,还有一些是典型的贫困户。这些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为此,社区安排社区工作人员采取专门结对帮扶的方式扶贫。帮扶资金来源于街道,先期帮扶对象共计23户人家,帮扶对象全部是低保人员,有的长期患有糖尿病,有的患有癌症,有的是先天智力残障,有的患中风,长期卧床,有些是男主人被判刑,家庭缺乏主要劳动力……,对这些困难家庭社区需要想方设法给予救助和解决,解决不了的困难提交给街道。

然而,S新村社区却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困境。由于缺乏自身造血功能,社区自救能力弱化。调查发现,50岁以上的S新村新市民而言,他们常常会产生自己已经被社会抛弃了的怨言:年龄大、没知识、没技能、没工作,有些年龄不到规定要求的人,还享受不到“低保”待遇。这个群体目前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事黑车和日租房生意,也是社区居民自救的无奈之举。事实上,解决拆迁社区新市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全国是一个普遍难题。社区可持续发展,必须得有可持续的经济来源。这种经济来源,应该在新市民社区发展的初始阶段就要着力谋划和思考好。现在许多新兴社区出现的问题正是在这里。由于普遍缺乏顶层设计,所以导致许多拆迁安置社区由“社区管理”变成了“物业管理”。社区居民对集体参与社区管理缺乏兴趣,社区管理者也很难找准自己的工作定位和突破口。对拆迁社区来说,怎么能够做到“不差钱”是个大问题。目前,有些地区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所以,在新社区建立之初,应该预留部分集体土地进行开发和经营。这样,既可以不断增加社区自身造血功能,壮大社区经济实力,同时还可以吸纳社区居民广泛就业,对促进社区管理和帮贫扶弱都会起到积极作用。

2. 熟人社区的治理实践

在社区治理上,社区居委会沿袭农牧场“场带队”村庄治理模式,让在本村庄生活的“熟人”来管理社区。社区“保留并发挥传统农村行政村社会资本(如熟人社会)与乡村治理精英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并创造合法过渡程序实现乡村治理精英向社区治理精英的角色转换”。^②

延续乡村治理模式的熟人治理成为转型新市民社区的重要特色。S新村居委会负责人也不例外,他至今已经担任了9年的社区主任。根据街道主管领导解释,最主要原因在于他是“土生土长”的一大队的人,平时社区上访、闹矛盾的都是一大队的拆迁新市民,他算是“临危受命”。由于农牧场拆迁户上

①陈志强、张红:《构建和谐社会的社区视角——以上海社区网格化管理为例》,《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②沈承诚:《论经济性特区的社区治理:二元社区形态与差异治理模式》,《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访和堵路等矛盾比较集中,街道主管领导认为他对新村情况了解和熟悉,对社区“维稳”有帮助,于是就选他为 S 新村社区主任。我国基层居委会由居民选举产生,所以得走选举程序。居委会选举也不是漫无目的选举,而是有针对性。选举前,街道主管领导都会有看好的对象,选举前,会预先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确保街道看好的对象能够当选。如果领导看好的对象“落选”,说明选举委员会工作没有到位。能够被街道领导看中的人,都是“政治素质很可靠”的人。街道领导需要那种既了解社区,又有一定群众基础,在社区里有人缘、有威信的人,社区里不管出现什么事,都能“搞得定”、“摆得平”的人。原因很简单,没有人希望社区出现问题。如果一个人稳定不了社区,一旦出乱子,那么街道会很麻烦,也会影响到工作。S 社区作为城镇化转型期的过渡社区,尤其需要社区强人,也就是“主张村落权力的,就是这些领袖人物中能够对内对外把各种利益关系‘摆平’的代表人物”^①。

然而,S 新村社区工作人员收入不高而且工作强度大是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他们的基本工资标准是:社区主任一个月 2600 元,社区副主任一个月 2300 元,一般工作人员是 2000 元一个月。除了基本工资,街道还另外给他们加班工作补贴以及拆迁等各类奖金收入。由于社区主任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而且在 S 新村工作多年,在社区时间长了,混得脸熟,工作干起来就顺手得多。“买面子”是社区工作的诀窍,但是,面子卖给谁,给什么样的人“卖面子”则不一样。“买面子”是熟人社会的典型特征。因为是熟人,好多事情好办得多。社区里许多事情应该属于物业来管,但 S 社区的物业属于居委会。说起来是物业管,实际上还是居委会在做。由于小区居民从来不交物业费,居委会还得承担每年环境垃圾处理的费用。

S 新村社区当前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工作人员对社区治理缺乏信心。就社区管理者而言,他们既有工作难度,同时对自己的工作颇为悲观。在他们的眼里,城市社区要管好,“得牺牲一代人”。社区管理者理由似乎很充分:新市民社区里面 50 岁以上的这一代人,这些人都是农村过来,有一种小农民意识,保留着自给自足的农民经济传统,尽管环境变化了,但是这些人还有好多农民的传统习惯甚至陋习在里面。社区里面到处堆放着社区居民保留着农村使用的农具,尽管现在没有农田没有土地,但这些农具依然摆在那里,堆在社区有碍观瞻。这已经成为社区管理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与整个大学城整洁环境不协调。社区管理者不从社区管理根本上想办法,而是以懈怠思维方式机械处理,认为“如果这一代人不走掉的话,可能在小区文明程度提高这一块肯定会受到影响”,其实是对现实状况的放任和无奈。

三、S 新村社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治理实践的反思

观察 S 新村社区,在转型社区发展中,社区更多是从管理和“维稳”的角度考虑,而对于社区居民服务缺乏顶层设计。新市民的社区认同感不强,家园意识缺乏,甚至还有居民认为“今不如昔”,不如退回“场带队”的村庄时代,这首先源自新市民对自己的未来生活缺乏安全感和信心。农民在拥有自己土地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其最终的退路依靠和保障;处在城市社区里的新市民保障和依靠缺乏,加上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健全,抗拒风险意识和能力弱化。因此,深度观察这个“场带队”的新市民社区,新型城市化社会支持网的建立,最重要的要依托转型新市民社区支持来实现。其中,社区接纳和包容是社区建设最基本的支撑点。而社区主动抛弃、放弃新市民才是社区变迁面临的最大危险。这一切都在考验着社区管理者的智慧。目前社区管理与服务者的能力、素质和水平远远不能适应新市民社区发展的需要,距离新型城市化社会支持网建设还有不少距离。S 新村社区居委会书记是一位转业军人,社区主任实际上

^①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第 68 页。

也就是社区变迁前的村长而已。他们治理社区,只是延续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或者变成上级街道部门的传声筒。真正把新型城市化的社区管理和服务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城镇化的建设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所谓“人的城镇化”,就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将人民群众的利益置于首要位置的城镇化。更具体地说,对于农民而言,“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必须得完成三大任务:一是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这不仅是指从农业生产转为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也包括农业本身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小农经营方式转变为现代产业运营方式。所以,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并不是不要农业或忽视农业,而是完成农业现代化的转变,其结果与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是一致的;二是实现生活方式的转变,实现农民、农民工以及广大农村的生活方式融入现代文明体系,形成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理念,包括将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引入到新农村的建设之中;三是实现社会权利、权益的公平公正,这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等一系列的社会体制、机制的建设和完善,这当然也包括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①

城镇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社会经济关系、人口、生活方式等由农村向城市转化的过程。“转型社区”首先是以转型为底色。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既是一个价值理想,也是一个理论范式,同时还是一个社会过程。^② 城市化不仅仅单纯地表现为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口数量向城市的转化,更主要的是人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等方面的转变。城市化至少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城市各种建筑群、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的建设,这是一个外化的物质建设过程。二是指城市的空间分布不断由一个独立状况转化为相互联系且日益密切的城市网络或城市带的过程,这是一个空间扩张的过程。三是指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条件、制度、社会心理等都变得越来越具有城市性特点的过程,这是一个精神文化建设的过程。四是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个体素质、价值观念等逐步转向步转向现代市民的过程,这是一个作为城市居民发展的过程。一个完整的城市化过程实际上应该同时包含物质与空间建设、精神文化与制度建设和城市居民自身建设等几个方面的内容,而且物质与空间的建设主要表现为一种物质性的“数量”特征,其体现的是“以城为本”的发展理念,而精神文化与制度建设和城市居民自身建设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上转向现代市民的过程,这是一个作为城市居民发展的过程。一个完整的城市化过程实际上应该同时包含物质与空间建设、精神文化与制度建设和城市居民自身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内容,而且物质与空间的建设主要表现为一种物质性的“数量”特征,其体现的是“以城为本”的发展理念,而精神文化与制度建设和城市居民自身建设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性的“质量”特征,是属于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城市化,其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质量”特征是属于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城市化,其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③

在国家以单位为基础实现了整个社会垄断之后,S新村社区作为大学城的一个“个体单位”,其实是国家组织的一种延伸,由此保证国家通过单位与每一个人发生直接而具体的联系。^④ S新村社区变迁所形成的“新市民阶层”,实际上是新市民没有彻底融入城市社会的状态,或者说是“城市化的不彻底”状态,这些新市民在社会行动上与城市社会还有着明显的隔膜以及对城市社会的不认同感,在社会认同上表现出内部化、边缘化倾向,包括新市民的社会交往方式,目前也还只是仅仅停留在村落的熟人社会里。

在现代社会,反思“被引入系统的再生产的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⑤。的确,反思是人类的基本行为之一,通过反思,思想得以深化、认识得以澄清。目

①李强:《主动城镇化与被动城镇化》,《西北师大学报》2013年第6期。

②黄锐、文军:《从传统村落到新型都市共同体:转型社区的形成及其基本特质》,《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4期。

③文军:《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

④X. Wu, “Work Units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Effect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Urban China”, *Social Forces*, vol. 80, 2002, pp. 1069-1099.

⑤[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前,人们已经认识到,现代性(modernity)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征,现代性使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富有和文明;另一方面,它的负面作用也引发了人类社会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困境。正是现代性的这种两面性,导致了科学主义的泛滥、工具理性主义横行以及启蒙精神的分野。西方现代性论者代表人物,如吉登斯、哈贝马斯、贝克等人一直坚持现代性立场,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跳出合法性、理性化、工业化等强调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个体对立而存在的思维逻辑,因此无法彻底对强调微观层面的后现代论者,尤其是积极建构性的后现代论者进行具有说服力的回应,而后现代论者如福柯等人则着眼于现代性发展的负面后果,通过解构的方式强调现代性论者的观点是“此路不通”的理由,而指出了对建构性的另寻它途其实是徒劳的观点。旧式现代性是一种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必须实现由旧式现代性向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现代性的跨越^①。在此情况下,“新型现代性”的概念和理念的提出便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新型现代性理念中的“以人为本”,其基本路径是沟通与协商^②。也就是说,社会行动主体要通过相互认同、相互妥协和相互协商的形式达成各自的互动目标,抛弃主观设置的沟通障碍,以协商共存的理念来约束各自的行为,同时建立有效制度,规范和约束行为主体行为,形成行动主体间的良性互动。现代社会中,社会行动主体的基本后果应该是“良性共构”的共赢局面,努力寻找共构共赢新路,从而形成和谐共生的新局面^③。“共生”是现代社会中行动主体互动的终极目标^④。社区治理通过在某一领域内的“共构”式互动,达到一种共赢的客观结果,最终在所有领域内实现互动主体共赢。与征地过后的城市化新市民普遍陷入“社会排斥”或者“社会边缘化”情形相比较,新市民应该分享更充分的城市化利益与更高素质的城市生活,而且同时还享受着具有自身历史文化认同所带来的社会心理满足。我们不希望看到转型新市民社区“那里既充满了无所事事的人,也充满着终日操劳却收入微薄的人”^⑤。

(责任编辑:杨嵘均)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Urbanization of S Village in NJ City

SONG Zhe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data from the new residential community S in Xianlin College Town of Nanjing, we identified a mode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its urbanization,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building a new type of networked community on the basis of its previous acquaintance society. The case study, though limited in its scope, enables us to realiz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ly urbanized communities should tak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development as its priority and help citizens in these communities successfully adjust their values and life style. That is to say, the key to a successful urbanization lies in always putting people first in practice and fully understanding in theory that the essence of urbanization is to help people live a new type of decent urban life.

Key words: new-type urbanization; new citizen community; networked governance; acquaintance society; people-orientated

①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6页。

②王道勇:《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现代性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8年,第133页。

③杨敏:《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王道勇:《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现代性变迁》,第231页。

④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16页。

⑤[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04页。